

# 试论修辞叙事学的修辞效果

王委艳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对修辞叙事学修辞效果的研究是修辞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效果研究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作者通过文本在读者那里达到的效果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因此,这种研究带有某种尝试性。对叙事修辞效果的研究首先是对产生效果的基础进行分析,探讨影响效果的诸种因素,然后,对叙事修辞的各种效果再进行具体的分析。

**关键词:**修辞叙事学;作者;文本;读者;修辞效果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10)03-0068-06

## 一、修辞叙事学修辞效果产生的基础

修辞叙事学主要是研究作者通过诉诸文本的一系列修辞策略达到最大限度地影响读者,取得理想的修辞效果的。因此,研究修辞叙事学不但要研究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修辞性关系,关注一系列的修辞策略,对修辞效果的研究也是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效果、修辞效果以及小说修辞效果(即叙事作品的修辞效果),李建军在《小说修辞研究》中曾作过这样详尽的论述:

“概括地说,效果通常是对某种活动产生的结果的积极评价,是指这种活动将对人产生有益的影响。这样,修辞效果就是指作者利用各种技巧手段,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并对读者所产生的积极的感染力和影响作用。而小说修辞效果,就是小说家利用小说艺术的各种技巧手段,对读者发生的积极作用,即通过说服读者接受作品所塑造的人物,认同作者在作品中宣达的价值观,从而最终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达成精神上的契合与交流。”<sup>[1] 1264</sup>

对叙事修辞的效果从理论上虽然可以做出这样的描述,但是,这里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效果的产生必须在作者——文本——读者的关系链条中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有了这样一个平台,效果才有显现之地。那么,这个平台是什么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对作者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作者的身份并非是一个天生的命定,而是经过了长期学习实践锻炼而成。因此,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位优秀的读者,作为读者的作者对于前人作品的阅读、消化、吸收、借鉴和创造构成了任何一位作者必走的人生路线。作者的读者身份与阅读生涯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可资超越的基本坐标,同时,也给了我们另外一种提示,即作者与读者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作者是从读者那里走出来的。这种关系为叙事修辞的效果提供了一个基本前提,即作者和读者拥有共同的阅读经验,这就为作者通过作品与读者交流并在读者那里产生阅读效果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其次,作者的创作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前辈作品的继承与创新,继承是文学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础,创新是文学发展的生命所在。摆脱前人的束缚,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天空,从来都是历代作家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与这种追求相伴而生的还有作家强烈的焦虑心境。美国著名学者布鲁姆提出的“影响的焦虑”理论为这种继承和创新的临界状态提供了一种准确的理论描述:“一个时代的反讽不能成为另一个时代的反讽。但

收稿日期: 2009-12-06

作者简介: 王委艳(1977-)男,河南内黄县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是影响的焦虑却牢牢地扎根于一切文学想像的基础。竞争——争夺审美制高点的比赛——在古希腊文学里是非常明显的。在不同的文化中,竞争的形式有所差异,但那似乎只是程度的不同,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柏拉图与荷马之间的竞争是西方文学的核心竞争。此后还有不少对手间的争斗,直到海明威与他的前驱们之间的——以及他的追随者们与以及成为大师的海明威之间的——戏仿式对抗。”<sup>[2]</sup>作家在继承和超越之间的这种焦虑状态永远是文学发展的动力所在,继承是每一位作家的宿命,超越是每一位作家的使命与生存之本。正因为有了继承,作家才能够通过文本与读者找到共同的知识基础;正因为有了创新和超越,作家才能够通过作品所提供的新的视域来培养读者(包括未来的作者)。

第三,文学的继承有着一系列的显在特征,这些特征为接受效果提供了参照,同时,也揭示了效果产生的作者的、文本的与读者的基本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作者才能创造与超越、文学才能发展与更新、读者才能在原来视域的基础上建立自己新的视界。比如文学的重复、互文性、原型、母题等等,都为这种继承提供了理论视域,同时,也提示了作者——文本——读者交流的基础与叙事修辞效果产生的基础。

## 二、影响修辞效果的因素

### (一) 作者因素

作者作为文本的建构者,对作品修辞效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长期以来,西方文论对作者采取了“放逐”的态度,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罗兰·巴特甚至宣布作者的死亡。巴特在《作者的死亡》一文中批判了古典主义批评站在作者一边的做法,认为“古典主义的批评从未过问过读者;在这种批评看来,文学中没有别人,而只有写作的那个人。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不再受这种颠倒的欺骗了,善心的社会正是借助于种种颠倒来巧妙地非难它所明确地排斥、无视、扼杀或破坏的东西;我们已经知道,为使写作有其未来,就必须把写作的神话翻倒过来: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来换取。”<sup>[3]</sup>在此,我们不能同意巴特武断的观点,文学批评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站在一个角度而否定其他角度。文学批评更应该表现为一种兼容并包的批评文化。

与巴特不同,韦恩·布斯则强调了作者对于修辞效果的影响。“从作品中清除每一个看得出的个人色彩,每一种特殊的文学典故或生动的比喻,每一种神话的或象征的形式,因为它们都明确地进行了评价。任何一个有眼力的读者都能辨认出他们受到了作者的影响。”<sup>[4]</sup>

从创作论的角度看,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其人生阅历、文化修养、道德情操、审美喜好等等都是创作的影响因素,都关系到作者的选材、取舍,关系到思想的宣达、情感的宣泄、主题的营造。此外,站在微观创作论的角度来看,灵感、际遇、感觉、想像、情感、顿悟等因素都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价值与接受效果。作者的创作理念也是影响修辞效果的因素之一。纵观叙事作品的历史,从再现到表现,从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浪漫主义,再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者从不同的创作角度进行创作达到了不同的修辞效果。比如现实主义小说,以“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为目标,以真实反映生活为宗旨,带给人的是一种现实的力量与感受;而现代主义小说则描写现代人生活在荒诞世界中的异化,采用象征、意识流等手法表现世界,从“叙述一个冒险故事”到“一个故事的叙述冒险”,这种写作方式给读者的影响显然与现实主义是不同的。

站在叙事学的立场上,我们发现作者视点选择、叙述方式选择的不同会产生不一样的叙事修辞效果。比如侦探小说,它往往选择第三人称限制视角而不是全知视角。另外,它还采取预叙、补叙、倒叙等各种叙述方式,还采用设置悬念、故意加快或减缓叙述节奏等手段来吸引读者,使故事达到引人入胜的修辞效果。再如中国的章回小说,用设置“扣子”的方式来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作者的人为因素对阅读效果的影响。

因此,作者作为修辞效果的影响因素,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修辞叙事学理论对作者的重视正是基于作者的客观存在性与不可忽视性。作者作为修辞效果的影响因素,其原因就在于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目的性。正因为有了作者有目的的能动性创造,才使读者有阅读对象,从而产生修辞效果。

### (二) 读者因素

读者的阅读意味着叙事作品的最终完成。因此,作者想要达到预期的修辞效果,离开读者这一因素是无法想像的。读者对于修辞效果的影响无疑与作者同等重要。站在接受主体——读者自身的立场上来看,首先,其身世经历、文化修养无疑是影响叙事修辞效果的重要因素。试想,一个与作品人物有相似经历的读者和一个与作品人物经历不同的读者阅读作品产生的修辞效果肯定会有所不同。前者会引起共鸣,而后者则可能对作品感到新鲜或者陌生。文化修养的高低也会直接影响接受效果,一个有诗词修养的读者读《红楼梦》会不时地为其中的诗词所倾倒,而对诗词毫无感觉的读者,反而会认为其中的诗词给他带来了阅读障

碍,会认为读《红楼梦》远远没有读武侠、言情来得痛快。其次,修辞效果也受读者阅读目的的影响。正如我在本文第二章第一节中对读者的分类:普通读者、作者读者和批评家读者,这三类读者的阅读目的显然不同。普通读者阅读作品或怡情或增智或只为打发时光;而作者读者除了普通读者具有的目的外,还可能为了借鉴、吸收别人的创作经验、方法等;批评家读者更多地则是站在理论的高度对作品进行评判。很显然,在这三类读者那里产生的阅读效果是不一样的。

读者对修辞效果的另一影响来源于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个体差异。个体差异的存在必然会引起对同一事物在理解上的偏差,作者所期望的“理想读者”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真实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修辞效果与作者想要达到的修辞效果是有距离的。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总是根据个人的情况理解作品,就会与作者意图出现偏差,这样在阅读时就会出现矛盾与张力。这就需要读者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既不为作者某些错误思想所左右,又要对作品进行合理的“误读”;既不随意阐释作品、歪曲作者原意,又不盲从作者成为毫无主见的“应声虫”。

接受美学把读者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读者才是作品的创造者,才是作品的真正作者。这种说法显然有些过激,但是,它指出了读者之于作品的重要地位却是值得肯定的。接受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期待视野”、“前理解”等等,无不说明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储存器,而是一个能动的创造者。因此,修辞效果的实现离不开读者的能动创造,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不难理解读者其实是站在与作者平等的位置,以作品为媒介进行一种修辞性交流,交流的结果就是修辞效果的实现。

### (三)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虽然是外在于文本的因素,但它对修辞效果的影响却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社会因素作为一种间接的、潜在的因素对作者的修辞行为、读者的接受行为构成影响。社会的政治制度,民主程度、思想潮流等等都会影响作家的创作。战乱时代的作家作品往往与多灾多难的时代、民族相联系。如中国抗战时期,很多作家写出了慷慨激昂的爱国作品,起到了影响读者(观众)、激发爱国热情的作用,起到了很好的修辞效果。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转型时期,则涌现了很多先锋作家,他们把人生的不确定性、思想的波动、转型的焦虑等等用不同于传统的小说形式、语言、故事叙述方式表现出来,在读者那里激起各种各样的反应,达到了彰显先锋姿态的修辞效果。

社会风气对作家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尽管有的作家声称自己不是社会风气的随声附和者,但只要他还是一个社会中的人,那么,他就无法逃脱社会对他的影响。丹纳指出:

“必须有某种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因此,气候改变,才干的种类也随之而变;倘若气候变成相反,才干的种类也变成相反。精神气候仿佛在多种才干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由于这个作用,你们才看到某些时代某些国家的艺术宗派,忽而发展理想的精神,忽而发展写实的精神,有时以素描为主,有时以色彩为主。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方向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sup>[9]</sup>

社会风气不但影响作家,而且会影响读者。一个时代的阅读趣味、风尚会直接对读者的阅读选择产生影响,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抛弃旧的阅读风尚而对新的时尚阅读趋之若鹜。当革命题材小说成为流行的阅读时尚时,言情、武侠小说肯定不为多数读者所青睐;相反,当更多的年轻人去阅读韩寒、郭敬明的作品时,革命题材的作品在他们那里肯定没有市场。革命时代需要革命式阅读风尚,消费时代则更多的是消费文化。

由此可见,社会因素对修辞效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它往往作为一种文化背景对文化发展起支配作用。修辞叙事学不同于以往的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也不同于将社会排斥在外的经典叙事学理论。修辞叙事学关注的是任何对修辞及其效果产生影响的因素。因为,一种理论只有采取了开放的兼容态度,才能够眼界宽阔而不至于成为井底之蛙。

## 三、修辞叙事的各种效果

叙事作品的修辞效果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由于影响修辞效果的因素多种多样,构成小说的因素也有很多,那么,每一种因素都会产生不一样的修辞效果。李建军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

“小说的修辞效果主要体现为与读者和写作相关的可读效果与可写效果,与作品的生命力和影响的持久性相关的长期效果与短期效果,与再现和表现相关的客观真实效果与主观真诚效果,与读者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行为相关的道德净化效果,以及与作品的核心理念及写作主旨相关的主题效果。”<sup>[11] 277-278</sup>

李建军从作者、读者、文本等方面总结了各种修辞效果。在此,我并不想面面俱到地进行论述,我认为,

作者、文本只是构成修辞效果的基础,因为,没有作者修辞行为创造下的文本就谈不上在读者那里形成什么修辞效果,更谈不上效果的各种形态。要谈具体的修辞效果必须从读者的角度切入,即读者在作者创造的文本基础上,在文本接受过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当然,在从读者角度论述修辞效果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回避作者与文本的作用。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1.怡情增智效果;2.意识形态效果;3.道德效果;4.文化传播效果。当然,这些也只是修辞效果的一部分,不能涵盖所有的修辞效果。

### (一) 怡情增智效果

作家采用一系列修辞策略形成的作品,目的就是把自己的审美情操、知识阅历、人生感悟、思想观念准确地传达给读者。因此,作家的这些努力便会形成读者接受效果的基础。而文本在读者那里产生的怡情增智效果则正是作家努力的结果。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在《谈读书》一文中非常生动地论述了读书带给人的怡情增智效果: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而书中所示,如不以经验范之,则又大而无当。”<sup>[6]</sup>

修辞的怡情增智效果虽然与作家的修辞性努力分不开,但是,读者的审美与求知动机也是产生怡情增智效果的重要因素。很多读者想通过阅读文学作品陶冶性情、增长知识,因此,他们阅读文学作品时心中总是充满期待。而“优秀文学作品中潜在的无限想像空间,真挚的情感境界,美妙的人生理想,正可以满足读者的这种期待心理。因此,人们在忧郁不安、悲伤失意之际,在繁忙工作之余,总喜欢阅读文学作品,以期进入一个超越自身、超越现实的想像境界,使情感得以调节,使精神得以舒张;以期领略人间的真情,体味人生的价值,使心灵得以振奋和净化,使人格得以提升。”<sup>[7]</sup>在怡情的同时,文学作品还向读者开启了了解另外一个世界的窗口,从而,增长知识。

### (二) 意识形态效果

作者的立场是作品非常重要的修辞策略,无论是作者有意识的表现还是无意识流露,立场总是在起修辞作用并在作品被接受的过程中显现其修辞效果。立场其实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杰姆逊在谈到意识形态时说,“阿尔图塞认为实践(如作者的创作——引者)就已经是意识形态,没有什么真理与错误意识的区别,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都有实践,因此也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杰姆逊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虽然是一些观点、思维方法、思想、甚至包括错误的认识,但又是处处体现在行为实践上的,这也就是叙事分析的基础。文化从来就不是哲学性的,文化其实是讲故事。观念性的东西能取得效果是很弱的,而文化中的叙事却有很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小说是叙事,电影是叙事,甚至广告也是叙事,也含有小故事。假如文化中没有这样一些构成成分,我们便无法展开分析。”<sup>[8]</sup>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在文学作品中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文学作品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模式”(ideological forms)“其目的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各个作品(电视小说、流行歌曲、小说、故事片等)表现世界特定表象的方式”,因为“社会充满了冲突,而不是一片和谐。在这种冲突中,作品会有意地或无意地倾向于某一方”<sup>[9]</sup>。

既然意识形态是作品的“特定表象方式”,是一种非技术性的修辞策略,那么,研究这种修辞策略所引发的修辞效果就十分必要。叙事作品的意识形态效果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首先表现为作品本身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其次,是由于作者与读者的立场不同导致的意识形态差异;其三,则是接受语境(文本语境、社会语境)的不同,带来了接受效果的偏差等等。所有这些都会为研究叙事作品的意识形态效果带来难度。杰姆逊曾有过这样的疑虑:“能不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谈文学作品的效果,这样做的结果令人满意到什么程度?”<sup>[8]28</sup>这其实也是笔者所顾虑的。詹姆斯·费伦教授从观察者(读者)的角度研究了这一问题。“是什么使特定的观察者选择一种阐释而非另一种……回答是意识形态的信念;“任何真正的判断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判断都简单地依据自身的意识形态信念”,“因此,意识形态信念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对事实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信念有助于以一种而非另一种方式构筑事实”<sup>[10]138-140</sup>。在此,“构筑事实”可以被看作意识形态的效果,但这和源于文本的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事实构筑,充其量只是一种不创造任何事实的、想像性的理论假设,这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质疑。费伦很清楚这一点,他说:“由于意识形态信念影响阐释,反过来又构筑但不创造事实,因此,我们关于这些事实的叙事便合情合理地提出了真理假说,但这些假说完全可能引起激烈争论。”<sup>[10]140</sup>

由于意识形态效果的复杂性,我们只是坐而论道是很难说清的。我们以余华的小说《活着》和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两个版本为例,通过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不同处理来说明这个问题。在余华小说《活着》中,作者采取了作者“引退”的叙事策略,把叙述者福贵推向前台,以此完成了由作者视觉到人物视觉的结构性转换。

作为叙述者的福贵，由于其阔少到贫民的身世背景以及对政治的特殊理解状况，很自然地便把政治推向远方背景的位置。政治，在此成了福贵眼中的政治，而福贵自然不理解作者处理政治修辞功能时所采取的叙述策略。在福贵眼中，政治是他生命中脱身而外的存在，是验证祸福、幸运的实验场；而在作者那里，政治被刻意推向远景，从而突显一种平民化意识形态的叙事立场，透露出浓重的“祛政治”色彩。而张艺谋的《活着》则恰好相反，用文字说明形式，用政治色彩十分强烈的几个时间段，如：“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等来叙事，从而突显了政治。这种文字说明为每一时代的时代特征作了实际的预设，这样有利于从政治层面展示人物，突出了政治在人物、故事进展中的作用，突显了意识形态对人物塑造的效果。

总之，意识形态效果虽然复杂，但却是研究修辞效果的重要内容，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效果多种多样，它为研究带来挑战也带来阐释的乐趣。

### (三) 道德效果

文学是人学，是通过一系列艺术手段写人的艺术。叙事作品更是与人的生活、命运相连，它记录人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人情冷暖、酸甜苦辣，描写人的伦理关系与道德情操，展示高尚与邪恶、伟大与渺小、磊落与庸俗等等。正如韦恩·布斯所说，“当给予人类活动以形式来创造一部作品时，创造的形式绝不可能与人类意义相分离，包括道德判断，只要有人类活动，它就隐含在其中。”<sup>[4]441</sup>“艺术家具有一种道德义务，就像他想要‘写好’、把尽可能在一个给定距离上实现他的世界作为自己审美义务的一个实质部分一样。”<sup>[4]433</sup>正因为道德之于叙事作品的文本价值的重要性，所以，对文本道德效果的关注才成为修辞叙事学效果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经典叙事学对叙事作品话语、结构的研究，从叙事的“技术性”问题上揭示了作品存在的意义。这种话语与结构分析作为一种叙事分析模式也许适用于对任何叙事作品的分析，但是，与道德伦理、情感立场等“非技术”因素毫不相干，因此，也无法对叙事作品进行道德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一部在“技术性”方面运作娴熟的叙事作品，如果缺乏高尚的道德力量，无论如何也不是一部好的制作。伟大的作品总是隐含了震动人心的道德力量，高尚的道德情操总是作品最动人的元素。正如梅内尔所说：“具有多样统一性、或者对个人或社会各方面进行准确描写的出色的文学作品，并不具有第一流的价值，除非它对人生某个问题表现出或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道德关注。”<sup>[11]</sup>因此，“具有第一流的价值”的作品必然是高尚的作品，是具有道德影响力的作品。“艺术的力量在于吸引和掌握观众、读者和听众。与艺术的多种极为重要的功能相比，这绝不是某种次要的、附属的东西。任何重要的艺术作品都包含着、或者更准确地说，实现着自己的‘最高任务’——激起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给他们以感情和道德上的影响。”<sup>[12]</sup>

与经典叙事学不同，修辞叙事学不仅关注修辞的“技术性”因素，同时也关注包括道德在内的“非技术”因素。道德作为优秀作品的必备元素，其修辞效果也是修辞叙事学研究不容忽视的。但是，道德效果和意识形态效果一样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只有借助作品才能把握其存在形态。例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就是一个典型，它的发表引发了关于道德与爱情的热烈争论。小说描写了“母亲”与一个干部刻骨铭心的精神之恋，放在今天这好像并没有什么，而在小说发表的那个年代，它所带来的道德冲击却是相当强烈的。刘恒《伏羲伏羲》中的娼侄之恋与追求自由解放形成的道德冲突，在更多人看来，应当冲破封建伦理道德去追求自由。余华的《现实一种》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的兄弟之间存在的手足亲情的道德标尺，如何在一个接一个的杀人场面面前被彻底瓦解。张承志的《黑骏马》中，男主人公白音宝力格由于当初无情地抛弃女友，而带给自己内心的道德折磨与心灵忏悔。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作者的道德修辞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道德思考与冲击。作家正是把作品中对道德问题的一遍遍追问放在人生、人性的天平上来彰显，才使作品充满对人类终极关怀的道德力量，从而在读者中引起回旋不尽的道德效果。

### (四) 文化传播效果

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说自古就有，但是，从来没有像近代以来发展得这样快捷。现代交通、通讯的迅猛发展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发展，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信息在鼠标点击的瞬间便出现在人们面前。文学作品的情形同样如此，搜索一位作家的作品只是瞬间之事，而且，有时还会出现成千上万条可供选择的各类信息。因此，研究信息化社会给叙事作品带来的文化传播效果，对于修辞叙事学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文坛受国外文学作品、文学潮流影响之深之广是近代以来值得关注的东西。“五四”新文化革命以来，中国作家受国外小说影响，其创作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叙事方式、语言方式、思想、意识形态到各种文学流派的创作理念都对现代中国小说文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就承认自己写《狂人日记》是仰仗了自己的医学知识以及所读的一些外国小说。而中国作家对国外文学各个流派的学习借鉴虽然有些混乱，

但那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繁荣局面的确让人看到文化传播所带来的修辞效果。这种效果不但培养了一批中国的现代作家,而且,培养了一批现代小说的读者,对中国整个文化的现代转型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

另一次让人注目的国外文学作品引发的文化传播是上世纪 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时期,国外现代派、后现代派作品再次在中国文坛掀起冲击波。很多先锋作家都承认他们的创作是受了这次文化传播的影响。余华曾说自己的作品受卡夫卡、川端康成的影响;格非也说他读了国外现代派的作品后明白了原来小说可以那样写。马原、洪峰、残雪、刘索拉等作家的叙述革命很明显受了国外现代派作品的熏陶。所有这些无不是文化传播给包括叙事作品在内的文学作品带来的修辞效果。

以上例证使我们更多地看到文化传播对作家式“读者”产生的影响效果,而对其他读者而言,这种效果的产生也不比作家更弱。虽然,他们不能像作家那样把这种效果以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作家的成长离不开读者,从中国当代作家的繁荣程度来看,可以判断中国的读者群对于他们的创作并不陌生,因为,他们也同样受了国外文学作品传播的影响,其效果在阅读中国的当代作家作品时便显露出来。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文化传播日常化、泛化,使人在这种泛化时代对文化传播效果毫不觉察。互联网使世界变小,使文化传播产生效果的周期缩短,从原来的“批发”变成了现在的“零售”,从原来的“单向”(对中国人而言)输入变成了“双向”交流。网络作为一种“文本外”修辞策略正在发挥其文化传播的快速优势,其日常性、及时性使文化传播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存在。修辞叙事学效果研究对文化传播效果的关注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修辞叙事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因为,这符合修辞叙事学研究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修辞性关系的学科要求以及当前文学发展的实际。

总之,叙事作品的修辞效果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范畴,可以这样理解,叙事作品给读者带来的种种效果都可以看做叙事修辞效果。因此,以上提到的只是修辞效果中的几个典型的例子,不能涵盖所有的修辞效果,对修辞效果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 参考文献:

- [1] 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2] 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6
- [3] 罗兰·巴特.作者的死亡[M]//罗兰·巴特随笔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307
- [4] 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苏晓,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5] 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35
- [6] 培根.谈读书[M]//英国诗文选译集.王佐良,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7
- [7]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91
- [8]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66
- [9] John Storey.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4
- [10]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1] 梅内尔.审美价值的本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5
- [12] 赫拉普钦科.赫拉普钦科文学论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06

【责任编辑 赵俊梅】

## On Rhetorical Effects of the Rhetorical Narratology

WANG Weiyan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rhetorical effec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es of rhetorical narratology. The effect research is an open field of study. The effect is a complex existence that the author want to get from reader's reading the text, so the study effect is an attempt. In order to study rhetorical effect, the first thing we must do is to find its base and then analyze the influence things to it, at last analyze the various effects.

Key words: Rhetorical narratology; Author; Text; Reader; Rhetorical Effects